

# 谢辰生 口述

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谢辰生 口述  
姚远 撰写



# 谢辰生口述

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谢辰生 口述  
姚远 撰写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 谢辰生口述，姚远撰写.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108-06103-4

I. ①谢… II. ①谢… ②姚… III. ①文物工作—工作概况—中国  
IV. ①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4046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9

字 数 347 千字 图 34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序

金冲及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这是一个祖国文物守护人本着对祖先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赤子之心倾吐的肺腑之言。

我与辰生同志相知相交已超过半个世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十年，先后担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彼此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这种友谊和交往依然历久弥新。他常在晚上十时半打电话给我，谈的都是文物保护工作中遇到的甘苦，有时十分兴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又义愤填膺，对那些破坏文物事件蔓延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忧虑。他写给中央领导人的长信常常复印了寄给我，让我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因此，这本书中讲到的不少事，我是熟悉的。他的话从来是非爱憎分明、一针见血，没有那种常见的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地方，而又思维缜密、有理有据，话说在点子上，富有说服力量。这本《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整理得很好。我读的时候，常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对辰生同志，我是衷心尊敬和钦佩的。

在郑振铎、王冶秋两位前辈之后，人们称辰生同志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当之无愧。要承受得起这个称号极不容易，至少需要

有几个条件。

首先，他必须真正懂得祖国文物的巨大而不可替代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而且在这方面有着广博而扎实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有为此献身的强烈使命感，也不可能在提出意见时把话说在点子上，富有说服力。书中讲到“文化大革命”时保护北京建国门观象台的事，我当时就知道。那是为了兴建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铁一期工程。这条东西向的地铁线正好要穿过建国门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准备把观象台拆掉，也考虑到把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移放到他处保存。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是何等的大事，我国那时的经济力量又十分有限，施工单位又已经考虑到台上古代天文仪器的保存办法，一般人就不便再提什么意见了。辰生同志和罗哲文等三个同志在“文革”那样的混乱时刻却给周恩来总理上书，说这不仅是天文仪器的保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同一个点上有连续数百年的天文记录在全世界只有这一处，如果一移就完了。周总理看后，决定地铁在这里绕道过去，还亲自批了绕道所需的一大笔经费。观象台至今还保存着。书中还讲到一件我当时就知道并且十分钦佩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故宫午门前的广场作为冬天迎接外国首脑的仪式场所。辰生同志提出这是清代举行献俘大典的场所，不宜用来迎接外国首脑，这会被对方认为是有侮辱性的。文化部主要负责人说：这件事中央书记处已经进行过讨论和同意，不要再提意见了。辰生同志仍单独向中央上书，最后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改变了原有决定。这件事，我当时听了就肃然起敬。会这样做的能有几人？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广博知识，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其次，必须对祖国文物的全局情况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十分了解和熟悉。如果只是对祖国文物的某一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可

以成为这方面的优秀专家，却难以称作“祖国文物的守护人”。辰生同志亲历了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全过程，七十多年的岁月中始终处在文物工作的关键岗位上，奔走在文物工作的第一线。新中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第一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至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文物工作的法令条例几乎都是辰生同志参加起草或主要起草的。由他经手处理的保护文物工作的难题更多。辰生同志今年已是95岁高寿。他自己说：“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能有这样经历的，今天无第二人。他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识见，是我国文物工作的一笔重要财富。这绝非夸张之词。

也许最重要的，他将文物工作，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为了它，他可以丝毫不顾个人的任何利害得失。大约两年前，有一次他刚做完化疗就参加一次会议，我看他会间神情十分疲惫，午饭时一口饭也吃不下。过了半个多月，我打电话去，他说刚从杭州回来，我说你是该休养一下的。他说：“不，我是到杭州郊区去看明清民居。”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年过80后，他写过两首诗，也曾抄了送给我。一首是七绝：“革命何妨与世争，平生从未竞峥嵘。惯迎风暴难偕俗，垂老犹能作壮兵。”一首是七律：“而今垂老尚何求？维护原则敢碰头。污吏奸商榨民脂，精英文痞泛浊流。群邪肆虐犹桎梏，正气驱霾贯头牛。蒿目层楼忧社稷，坚持信念度春秋。”他忧什么？大概是爱得愈深，就忧得愈切，犹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实生活永远在矛盾中发展，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接踵而来。辰生同志在书中痛心地说：“前30年的破坏，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认识问题，但是在今天，主要是利益问题。”这些直率的话，不能不发人深思。

当然我不敢说他说的每句话和做的每件事都对。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的，除非他不做事和不说话。但他的信念是真诚而执着的，有如他诗中所说：“坚持信念度春秋。”

姚远同志做了一件很好的事。这本书忠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辰生同志的所思和所行。还做了详细的按语和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我们不是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本书主要不是一般的说理（编者把辰生同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长编词条“文物”列为本书的附录，是从另一角度所做的重要补充了），它可以说是辰生同志在七十多年漫长岁月中、处于文物工作全面性岗位上摸索和思考的忠实记录。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希望年轻一些的文物工作者，能够在工作之余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在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教益。

2017年5月6日 时年八十有七

# 目 录

|                     |     |
|---------------------|-----|
| 序 金冲及               | 1   |
| 第一章 平生只做一件事         | 1   |
| 一 到延安去              | 1   |
| 二 在郑振铎身边            | 11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事业    | 19  |
| 一 文物局草创             | 19  |
| 二 “后勤论”             | 36  |
| 三 “两重两利” 方针         | 42  |
| 四 第一次文物普查           | 54  |
| 五 发掘定陵与城墙存废之争       | 63  |
| 第三章 文物法制的初步建立       | 80  |
| 一 “大跃进” 的波折         | 80  |
| 二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 93  |
| 三 文化部“假整风”          | 101 |
| 四 文物商业的改革           | 107 |
|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文物事业 | 113 |
| 一 上书“中央文革小组”        | 113 |
| 二 力挽狂澜的中共中央“158号文件” | 118 |
| 三 周恩来重建“图博口”        | 130 |

|     |                     |     |
|-----|---------------------|-----|
| 四   | 文化组接管风波             | 143 |
| 第五章 | 从《文物保护法》到“101号文件”   | 158 |
| 一   | 力保王冶秋               | 158 |
| 二   | 制定《文物保护法》           | 169 |
| 三   | 胡耀邦：“我来当起草小组组长”     | 177 |
| 四   | 国务院“101号文件”的出台      | 203 |
| 第六章 | “十六字方针”的形成          | 227 |
| 一   | 两次西安会议              | 227 |
| 二   | 反对四种错误倾向            | 240 |
| 三   | 抢救三峡文物              | 252 |
| 四   | 《文物保护法》修订的斗争        | 273 |
| 五   | 坚持文物立法的方向           | 284 |
| 第七章 | 热血丹心护古城             | 292 |
| 一   | “我愿以身殉城”            | 292 |
| 二   | 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           | 313 |
| 三   | “文化遗产日”的诞生          | 332 |
| 四   |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记       | 350 |
| 五   | 南京古城的历史转折           | 365 |
| 六   | 文物不是“绊脚石”“摇钱树”      | 384 |
| 附录一 | 文物——《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 | 405 |
| 附录二 | 谢辰生先生参与制定的重要文物法规文件  | 440 |
| 附录三 | 谢辰生先生文物著述要目         | 442 |
| 后记  |                     | 450 |

# 第一章 平生只做一件事

## 一 到延安去

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这本书，是我进入文物工作的开始。从那时起，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这本《目录》本来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我参与了编撰。编这本书的目的，是用来向日本索还甲午以来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出版。到了最近几年，中西书局知道了这个事儿，找到了我，才在前几年正式出版。这都过了六十多年了。<sup>〔1〕</sup>为什么说这是我进入文物工作的开始呢？这得从我在1942年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事儿说起。

---

〔1〕徐森玉主编，顾廷龙、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编著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2012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目录》是在抗战胜利后为向日本追讨自甲午（1894年）以来被劫夺珍稀文物和要求战争赔偿，于1946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的。由徐森玉主编，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承担编纂任务的则是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编纂者倾注巨大心力，多方收集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图谱和目录以及张政烺等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共122种，收录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标出了高度、重量、口径尺寸、藏处以及所依据图谱的书名简称、页码等资料，编制了详细索引，方便各界读者使用。

我祖籍武进，落户安阳，生在北京。祖籍地是常州武进罗墅湾，我祖父谢恂（字仲琴）是武进县罗墅湾人。谢家是罗墅湾的大家，“洪杨之乱”，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江南折腾得厉害，谢家有点儿钱的都跑了。一拨上南方，一拨去北方。上南方的到了广州。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字菊生），他母亲是我们谢家人，所以我管他叫表伯。张菊生是广东那一支的，所以他满口广东话。

我祖父谢仲琴这拨儿就来了北方，到了河南商丘。祖父认识了袁世凯，成了袁世凯的把兄弟，关系好得不得了。后来祖父做了官，当了袁世凯的幕僚，小站练兵，去朝鲜，都跟着袁世凯。<sup>〔2〕</sup>后来袁世凯退隐到安阳，谢家也跟着到了安阳。袁世凯隐居在洹上村，可他在城里还有一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和袁家的房子在安阳城里就挨着。<sup>〔3〕</sup>袁世凯后来又出山了，他要当皇上，我祖父不大赞成，觉得不合适，你把皇上推翻了自己当皇上，这哪儿行啊！你还别说，这袁世凯还真是够意思，你不愿意来辅佐我，那你就在家养老吧。袁世凯就给了他十万两银子。我祖父拿了这十万两银子，一部分用来盖房子，在家休养；其他的钱全用来搞水利了，用这笔钱在河南浚县给老百姓开了一

---

〔2〕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谢恂，河南商丘县人，祖籍江苏武进县，历任新城县知县、平乡县知县（署理）、雄县知县、宣化县知县、蔚州知州，1907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委充天津地方审判厅刑事部长。〔《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7），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48—749页。〕甲午战争爆发前，1894年6月3日清政府驻朝鲜釜山商务委员李应晚请假就医，袁世凯遣差以谢恂代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71页。〕

〔3〕 袁世凯隐居河南时，常与谢恂等宾僚酬唱。据《清稗类钞》载：（袁世凯）常乘小舟，清泉披蓑垂纶，自持篙，立船尾，宾僚皆从游，赋诗为乐。次子克文曾梓《圭塘酬唱集》一卷。所与酬唱者，贵阳陈夔龙、永城丁象震、汲县王锡彤、商丘谢恂、庐江吴保初、合肥朱家盘、汉阳田文烈、宜宾董士佐、番禺凌福彭、元和徐元、吴江费树蔚、甘泉冈尔昌、桐乡严震、山阴沈祖宪，又女弟子二人，一静海权静泉，一江都史济道。〔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72页。〕

个天赉渠，到现在还在用。

我父亲谢宗陶，字菊农，也生在河南。我父亲兄弟四个，大伯父就是谢国桢的父亲谢宗夏（字锡成），二伯父谢宗华（字翊周），三伯父谢宗汾（字仰怡），我父亲行四。父亲京师大学堂毕业，也就是最早的北大毕业生，学的经济，他英文很好。<sup>〔4〕</sup>父亲走的是仕途，先后给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当过秘书，办过四存学校，后来当过吴佩孚政府的财务处处长，给河北省主席当过秘书。实际上我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的家庭出身。生我的时候，父亲在吴佩孚手下做官，大概人在洛阳。<sup>〔5〕</sup>

1922年，我生在北京南锣鼓巷前圆恩寺。我名字本来叫国愈，辰生是我的字，小时候觉得笔画太多，写字儿费劲，后来就用辰生了。我们家的兄弟是父亲下一代人的大排行。老大就是谢国桢（字刚主），老二谢国栋（字虚中），老三谢国樑（字历生），老四死得早。老五是谢国彦（字午生），是金石学家陆和九的得意门生，甲骨什么的收藏了很多。老六谢国捷（字戌生），后来是河北大学新闻学的教授。老七是谢国振（字雷生），燕京大学毕业的。我行八，国愈，字辰生。老九谢国权（字甲生），就是新华社的言彪，著名记者。老十谢国祥，就是后

〔4〕 谢宗陶 191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政治门，1918 年任北京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门研究员（财政学专业），是北大最早的一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705 页；孙家红：《通往经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9—60 页。]

〔5〕 谢宗陶先任徐世昌总统府秘书，他回忆“余家在豫时，与徐为通家至好，余又曾任其总统府秘书，与其亲信左右素稔，并曾为之创立四存学会及四存中学”。后任吴佩孚讨逆军军事参议处财政组主任参议、洛阳巡署财政科科长，为吴佩孚筹款。[谢宗陶：《徐世昌出任总统之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 41 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谢宗陶：《吴佩孚在洛阳之财政临时筹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41 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来搞过京剧音配像的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我亲兄弟四个，大排行的老六谢国捷，是我们家的大老，老七谢国振是我们家的老二，老十谢国祥是老四，我是老三。国祥是我亲弟弟，小我七八岁。他在天津参加的地下党，解放后当过天津市的团委书记，后来是天津市的宣传部长，很受李瑞环的信任，就是他搞的京剧音配像工程。兄弟之中，老八、老九、老十跟了共产党走，老六、老七曾是共青团员。老二谢国栋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苏联海参崴领事，后来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死在了台湾。

父亲在我出生之后没几天，请在天津的三伯父谢宗汾照顾我，我就被带到了天津，住在意租界北东马路，后来回的北京。我的小学一共上了好几段，北京上的培根小学、四存小学，高小时候我十二岁，又到了天津，在天津秀山小学毕业。秀山小学是北洋时期江苏督军李纯（字秀



谢辰生兄弟姐妹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谢国祥、谢辰生、谢絮清、谢国振、谢国捷

山)办的私立小学,所以校名叫秀山。那时候我父亲在天津先后做河北省两任主席于学忠和商震的秘书,就把我接了过去。1936年从天津回来,我又在北京四存学校上中学,从初一上到高二。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我父亲去了后方,我哥谢刚主是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也去了后方了,因此家里经济困难,休学了一年。1942年想投奔延安,高中二年级肄业,我的学历就到这儿了。

四存学校是徐世昌办的,我父亲参加了创办。四存学校的中学、小学都在府右街,就在中南海西门。原来中南海的红墙在里头,学校在外头,现在红墙扩了,把学校包在了里头。原来从灵境胡同到太仆寺街,这一大段儿都是四存学校。四存学校的小学是西式小学,但是《论语》《诗经》《左传》都是非学不可的。四存小学在北京很独特,“四存”得名自徐世昌倡导的颜李学《四存篇》,颜李学重实践,反对空谈。这个学校特色一是国学,这个小学出来的人国学底子都好;特色二是劳动,农业劳动也得参加。<sup>[6]</sup>四存出了不少人才,邓稼先跟我是同学。我的诗词底子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大多数旧体诗词都是在

[6] 四存者,存人、存性、存礼、存治。徐世昌创立四存学校,谢宗陶任四存学校总干事,并参与创办四存学校。谢宗陶回忆:“徐生长中州,原服膺程朱之学,入仕后即觉理学空虚,无补实际,渐向往于北方苦学派颜元、李塨躬行实践之说。及任总统后,首先明令崇褒颜李,奉其入孔庙陪祀,继而编印颜李学说书籍行世,终则创立四存学会(四存者存人、存性、存礼、存治)于京师太仆寺旧址,标榜‘倡导笃实学术,端正风气’。四存学会原聘赵衡为会长,赵不就,改聘张凤台(鸣歧),又以李见荃(备聪)为副会长,徐居名誉会长,其总干事一职即由余兼任。附设四存中学,校长为齐树楷,后又增设四存小学。”“民国八年(1919)创立之四存学会附设之四存中学,在府右街,以齐树楷任校长”,“严明校规,精研国故,督促学生专心读书,厉禁予闻外事,徐盖欲以所办之学校实现其教育理想”,“四存中学开办之初,齐树楷与余诣徐请示科目,徐意在国文课而外,必须注重历史课程,并畅论汉、唐、明、清统一寰宇之为盛世,指东周列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为乱世,谓:‘中国如为四分五裂之局面,则早被东西列强所蚕食鲸吞以尽。今所以犹屹然不被瓜分者,正赖于此统一国家耳!’”[谢宗陶:《徐世昌出任总统之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二十来岁时候写的，后来就没怎么写。我最得意的一首词，是抗战胜利前夕写的《满庭芳》：

一霎西风，暗消残暑，小庭悄酿秋寒。星河低转，人静夜初阑。身似浮萍断梗，把归思，付泪轻弹。空怅望，一弯新月，无寐忆江南。

天涯，伤迢递，聊凭尺素，强破愁颜。飘零后，赢得金缕衣宽。惆怅付于一醉，任韶华，随意阑珊。但频愿，早息烽火，人伴凯歌还。

2002年，四存学校校友返校聚会，我离开四存学校六十年了。我写了一首《浪淘沙》，作为纪念：

屈指六十年，过眼云烟。重逢旧雨话先贤。回首前尘伤往事，喜又团圆。

故旧半凋残，多少辛酸。新枝老树竞争妍。锦绣河山惊巨变，换了人间。

我读中学时，我大哥还没在北京买房子，我们家兄弟几个都住在太仆寺街的公寓。后来我住在白塔寺锦什坊街的小水车胡同1号，是谢国桢家的房子。大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大学者。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来往的都是像唐兰、容庚这样的名流，还有像梁启超的弟子刘盼遂、甲骨文专家孙海波等人。我从小在他身边，跟着他学了不少文史方面的知识，耳濡目染，就喜欢上文史、喜欢上文物了。其实，小水车胡同的房子是样式雷家的，特别好，可惜后来都拆光了，

地方用来盖金融街大楼了。一进门是一个院子，绕过去又是一个院子，然后是垂花门，又有一个院子。前后三进，东西两个跨院，有厨房、厕所，总共三十几间房。院里有丁香、藤萝架，住着真舒服。我要是留恋旧社会，可有的留恋的，但是我还是向往革命。

我的亲哥哥，六哥谢国捷和七哥谢国振，1932年参加过地下党组织，在北平大学附中参加了青年团。他们刷传单、刷标语“红军万岁”什么的，我都知道。我这俩哥哥，结果被抓人抓得厉害的第三宪兵队给抓了起来。我父亲毕竟上层熟人多，终于在被抓了一年多以后把他们保了出来。他们出来以后也就没再参加革命了。父亲对他们严加管束，后来谢国捷在辅仁大学毕业，谢国振在燕京大学毕业。中学时候老师教书，说新闻，说国际国内发生的事件，传播爱国思想，日本人也控制不住。那时候抗日青年还是多，我在中学时候开始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读进步书刊，觉得很有意思，慢慢思想就进步了，就想上延安参加革命去。我当时选择共产党，是经过慎重思考的。我在四存学校上学的时候，背的都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从小学历史，学会的是忧国忧民，想怎么样天下大同，人人都过得好。后来听说有共产党，看了进步书刊，了解共产主义理想，我想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们难道不应该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终身吗！

1942年夏天，我正在四存学校读高中二年级，该上高三了。我跟我弟弟谢国权及侄女谢莹——就是谢国桢的女儿——都很向往延安，想投奔延安去，可是家里不让走，害怕小孩子跑远了。我们就秘密进行，可是没路费，这怎么办呢？那时候正是暑假，我们仨都有学

费，我们就把学费凑起来，又卖了自己的自行车，就凑上了路费。我们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那时候走，并没有跟中共地下党有什么联系，完全是瞎撞，也不知道国共关系怎么样。我们就想，先到了西安，到了陕西，不就能到延安了吗？那时候我们中学都还没毕业，脑子想得简单。我九弟谢国权、我侄女谢莹和她同学解华芳（解冰），还有鲍文生，他们几个先走。他们到了西安以后，有认识的同学在那儿，就赶上了，最后谢国权过到延安那边去了。他们去了晋西南隰县的第二战区剧宣二队。剧宣二队实际上是我们的人在控制，是共产党的地下秘密组织领导。谢国权一开始也在剧宣二队，然后去的延安。他后来改名言彪，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谢莹和解冰就留在了剧宣二队，她俩都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谢莹后来改名谢纪青，先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后来在复旦大学教书。<sup>〔7〕</sup>

我留在北平，打算后走。谢国权、谢莹他们走了以后，我家里闹翻天了，就找到我，“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去哪儿了？你们成天在一块儿，你肯定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没法子，只好说实话了，说我们打算去延安，他们先走，我后走。结果怎么着？我家里说：“你走吧，走吧！得了，我们给你钱，你走吧！”这样子耽误了一

---

〔7〕 剧宣二队，即“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第二队”，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艺术组织。据田汉在《转战西北的剧宣二队》（原载1946年9月《新民报》）一文中介绍：“‘剧宣二队’为1937年在武汉成立的‘拓荒剧团’所改编。1941年5月他们以‘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的旗帜在兴集各地演出《月亮上升》《一心堂》《演戏》《败家子》《反攻》《国家至上》《狂欢的夜》《祖国》及三幕歌剧《农村曲》等，给沉寂的吕梁山剧运放射出活跃的朝光。他们搜集了五百多首民歌，他们用地方话地方的习惯演着农村的戏剧，他们把艺术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联系得紧紧的。”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山西文史资料》第50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剧宣二队在山西专辑”，内载“鲍文生，1942年同参加二队的谢莹、解华芳一同从北平沦陷区来山西，原想投奔延安，因交通不便，留在二战区政治部工作”（第108页），“这年秋天，北平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谢莹、解华芳，在爱国思想的促使下，从敌占区来到晋西，想到延安去，我们吸收他们二人到队工作”（第84页）。